

关于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中的 “左”倾错误问题之管见

任全才

大革命时期,中国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是重大的和显而易见的。当时,由于中国的封建势力与各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结成反革命联盟,这种反革命联盟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更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大革命最终遭到惨重失败。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多少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我们。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保留。”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二集,第313页)我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就主观原因来讲,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为主要原因外,还有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弄清这方面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吸取历史的教训。本文拟就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表现、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

从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也日益严重。

(一)在工人运动中,不少人受自发的革命热情所左右,不讲政策和策略,满足于“盲目的痛快干一下”(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他们可以“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商店。”比如: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起至1927年10月止,共计两年零四个月,这是世界职工运动有史以来罕见的长期罢工,它的意义远远超过罢工本身。但由于在罢工初期封锁香港以至于完全断绝海外交通,使任何国家轮船皆不准出入广州。这样,香港“肉食菜蔬,无从取得,猪肉涨至一元余一斤,蛋涨至五角多一个,牛肉几乎绝迹,街市等于虚设,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楼居者以纸包粪,抛掷街中。加以暑日炎蒸,臭气熏天,香港成为了臭港。”但最使香港痛苦的,还是经济上受到空前未有的打击。根据《中国海关贸易册》和当时香港报纸与政府通告,“平均罢工一个月,损失二万一千万元,罢工一日,损失七百万元。”商品输入输出,1925年皆只得1924年之半。再如商店破产,“仅就1925年11、12两个月,计破产的商店已达三千余家。”正如邓

中夏同志所说，罢工头两个月，“这种封锁不只封锁了香港，而且封锁了我们自己。”（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第231至235页）而组织罢工的工会成为“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这种现象在1927年前的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尤为严重，甚至发展到连党的领导机关也无法阻止的地步。

在工人运动中，还提出了不少“左”的乃至错误的要求。如：“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加到一至两倍）。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甚至党派领导干部和工会派纠察队去劝说工人，阻止工人提前下班，还遭到一些人的打骂。“还有革命群众内部的武斗，这和十年浩劫时期又多么相似啊！”（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当工人的过分要求不能达到时，便以长时间的罢工来对抗。结果罢工的时间愈长经济愈加困难。无论中国工人生活多么俭朴，工人最低限度的补贴，仅上海一地每月也要一百二十万卢布。加之罢工给国家整个经济造成极其重大的损失，维持罢工日益困难。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也认为，工人提出过火要求会导致工厂倒闭，最后“受苦的还是工人自己。”（参见苏联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53至154页）

（二）在农民运动中，“左”的东西更是异常普遍。除逮捕、监禁、审判、戴高帽子游乡、杀猪、崇谷之类手段大量使用外，枪毙土豪劣绅的事也常有。所谓“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人民日报》1981年4月25日，第五版）在任何审判会上，只要有一个人认定被审判者是土豪劣绅，就无人敢加以反对。当时，农村中普遍流传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说法。有的地方干脆把有五十亩田者一律视为土豪，穿长褂子者一律叫劣绅。对这些人的惩罚也是“愈激烈愈容易通过”。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农民协会的领导；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农民运动中的“左”倾情绪和行动已达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农民协会对北伐军军官家属、亲戚的土地和财产，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同样进行没收，对他们的亲属同样实行逮捕。就是一般平民，也要遭受拘捕和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商人受到勒索，甚至普通士兵寄回家的少数金钱，也常常被农民协会的人员没收或瓜分。

北伐战争的初期，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当时还不能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1926年12月20日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击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租减息、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农民问题只有经济意义。我们只想减租，不想夺取地主土地，因为这不是国民革命的任务。”（《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1926年12月22日第21期）但是，这一正确的政策，后来被农民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冲破或抛弃了。后来，中共土地委员会决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触动小地主和军人的土地。”但是，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许多农民协会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减租减息”（参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32页）。有些地方发展到“丈田插标”准备重新分配土地，甚至在湖北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直接写道，“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农民协会应当领导夺取土地的斗争”（参见苏联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这就违背了国共两党和农民协会原规定的政策。这个政策规定佃农所得至少应占收获额的百分之五十，银钱借贷年息不得超过二至三分，借谷年息不

得超过一成。也就是说，在当时并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诚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问题，是对农民的领导问题，而要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就必须有正确的土地政策。但解决土地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创造条件，看准时机。在土地政策问题上，右了，不能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于革命不利；“左”了，同样不能达到目的。当时党的任务，是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当时条件下，党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应当实行减租减息。这样既有利于统一战线，有利于北伐战争，又可以壮大革命队伍，争取更多人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提高共产党的威信。因此，党的一切政策，工农运动的一切行动都要有利于这个总任务。如果离开这个总任务，再高的热情，再“革命”的行动都只能导致“左”倾错误，最终造成革命的失败。

(三)在人民生活方面，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也有不少表现，当时出现了下述情况：农民协会逼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禁止抬轿子，甚至出现了为节约粮食而禁止农民喂鸭，为节约糜费而禁止演戏等“左”的作法。胡愈之同志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在繁华的街道上，男子往往被截住剪除长袍的下半截，梳头的女子被剪去头发。”（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这些做法是荒唐的。鸭虽然要吃谷，搓死禾苗，但它是农民群众不可缺少的家庭副业，而农村副业是发展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方面。包括戏剧在内的农村文化娱乐生活，也是劳动人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即使是农村存在着的旧风俗、旧习惯，由于它们是在长期中逐渐形成或代代相传下来的，因而不可能在一个早晨立即消除干净，必须是坚持长期的耐心的说服教育，不应实行强迫命令，更不应采取武力的办法来解决。

显然，工农运动中的上述种种“左”倾作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由于工会、农会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威信，这些错误所造成的影响更加深广，并几乎无人敢于认真进行有效的纠正。

(二)

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给革命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和挫折。

(一)“左”倾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统一战线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为国民党右派的叛变找到了借口。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例，这个拥有全省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民协会所掀起的惊天动地的农民运动，在受到了驻长沙的许克祥所辖的一千杆枪的马日事变的打击后，就土崩瓦解了。这股农民运动激流在湖南象山洪暴发似的奔腾而来，转瞬间又顿告消失，其间的因果关系，实非偶然。北伐军军官许多系湖南籍，士兵也不少是湖南人，而军官多数出身于地主家庭，士兵多数出身于农民家庭。农民协会对北伐军家眷亲属的那些“左”的做法，必然激起这些官兵的不满。加之土豪劣绅乘机造谣挑拨，反动分子蠢蠢欲动，使革命统一战线受到严重威胁。陈独秀于1927年6月20日在《湖南政变与讨蒋》一文中写道：“捕人、罚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同时举行宗教革命（毁庙、毁祖宗牌位），道德革命等，以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土豪劣绅多捏造许多事实在军队中宣传；反对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对民众运动之右倾分子更从而张皇其词，使湖南出身的军官咸抱不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示不满，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陈独秀《湖南政变与讨蒋》，1927年6月20日，武汉民国日报及《向导》，第199期）湖南是农民土地革命最剧烈发展的一个省，家在湖南的那些北伐军的

“将领们被农民运动搞得心神不定。他们作为土地占有者，本能地觉察到农民运动的矛头所向。第八军、第二军和第七军的将领率先反对农民夺地。”（参见苏联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这说明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给敌对分子造成了反对革命的口实，加速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叛变。正如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四届扩大二中全会决议上所指出的：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受很大损失。农民运动的发展，演变为对武汉国民党左派政权的一种威胁，加速了武汉政权内部的对抗与分裂。华岗在《中国大革命史》中写道：“武汉政府的迅速反动，便是土地革命深入的直接反映。”（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资料出版社，第284页）“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将军，于右任以及谭延闿在共产党人的‘不轨行为’和农民的过火行动中找到了共同的攻击目标。”（参见陈丕士《中国在召唤》，商务印书馆，第102页）简言之，由于革命运动的急剧发展和“左”倾错误的蔓延，使武汉国民党中央日益恐惧，一些代表封建势力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军人更是恨之入骨。于是“首先便有五月十七日夏斗寅的叛乱，接着就有五月二十一日何键、许克祥在长沙屠杀工农之惨变。”（参见华岗《中国大革命史》）对此，刘少奇后来指出：“这种‘左’倾错误至少帮助了反革命，正如西安的错误帮助了右派一样。”（参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二）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破坏了经济，引起了市民等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责难，并导致了革命队伍内部的种种纷争与冲突，削弱了革命力量，有利于反动势力的扩张。以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为例：由于工人在经济上提出过高的要求，不断罢工，使资本家几乎无利可图，由此造成企业倒闭。许多资本家纷纷关门、停业或逃跑。物资缺乏，物价飞涨便接踵而来。这一切又引起“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上述“左”倾错误，使革命减少了同情者和支持者，并促使中立者和动摇不定者疏远革命，向反革命势力靠拢，这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党的“五大”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指出：“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结果，使资产阶级受到了莫大的威吓，渐次背叛革命（蒋介石叛变）。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专力来打击工人阶级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第三册，第56页）再以农村中的“谷米阻禁”一事为例：所谓谷米阻禁，就是禁止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之间的粮食出境与入境，这就妨碍了商品流通。尤其是作为鱼米之乡的湖南等地，广大农民需要用粮食来交换各种日常生活用品或生产资料。农民的粮食不能出境，就无钱购进所需要的其它的必需品，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市民、军队的粮食供应。这样，致使商人、军官和地方各界对此禁令深恶痛绝，广大农民也抱怨不已。这些作法无疑都是有利于敌人，而不利於革命发展的。

（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直接败坏了共产党的声誉。人们一般都知道，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是由各级共产党机构和共产党员负责的。因此，工农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倾错误和过火行动，无论是不是共产党的决定，无论是不是由共产党人指示做的，都要通通加在共产党的头上。人们并不着重于责备工人、农民，也不着重于责备工会、农会，而着重于责备共产党。认为工农运动中的一切“左”倾做法都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了共产党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党。

的声誉，不能不说后来资产阶级右派的叛变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

总之，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就主观上讲有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有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有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过去，由于某些原因而回避了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胡愈之同志指出：“这些过左的作风，使党逐渐脱离群众，国民党反动派才有可乘之机。”这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三)

中国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中“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现仅就主观因素加以探讨。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 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中国党内在最初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两种错误意见：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他们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当时，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前一种占了上风，在党内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而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正确意见，却没有得到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以及对统一战线与工农运动之间相互的关系缺乏明确的认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在统一战线这个总政策的指导下，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政府。党的一切政策，工农运动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服从这个总政策和总任务，都必须围绕这个总政策和总任务来进行，决不能为了争取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而损害整个革命的长远的阶级利益。刘少奇在《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的通信中，曾针对工人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指出：“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过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不能以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经济利益也有最高的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资本家仍然有利可图；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的国民革命的利益冲突。”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时说：“我们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11页）这些论述，不仅对工人运动适用，而且对当时的农民运动也是适用的。因为，农民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实质，仍然是没有“顾及联合战线”，并“与当时的国民革命的利益相冲突”。但是，那时年轻的党中央对工农运动既没有什么长远的指导规划，又没有清醒地估计到运动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及其后果，尤其没有自觉意识到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对统一战线可能造成的危害，致使问题暴露出来后，弄得手忙脚乱，甚至束手无策。

(二) 在理论上偏颇，片面强调“矫枉必须过正”，因而对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采取容忍、迁就态度，使“左”倾错误得以蔓延。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什么必须过正

呢？不过正不行吗？是长期过正，还是暂时过正？要过正多少？由于没有明确的界限，过正的尺度也是很难掌握的。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不断把运动推向极端。毫无疑问，工农运动是广大工人、农民两个革命阶级独立自主的革命运动，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革命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他们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和偏差的确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应横加指责和压制。但是，工农运动应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进行，否则将向工联主义或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而不可能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求得最终的彻底解放。正因为如此，党应当在充分尊重工农群众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同时，负责指导工农运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把工农运动与整个革命事业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片面强调“不过正不能矫枉”，就会使党的干部作群众的尾巴，跟在工农运动后面跑，而不能对工农运动中出现的那些严重违背政策、妨碍以至破坏统一战线、危及革命大局的错误行为旗帜鲜明地加以纠正，从而使“左”的东西愈演愈烈。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中，曾一度片面强调“不过正不能矫枉”，不准对群众运动“指手画脚”，使不少干部难以对工农运动实行有力的领导，“左”倾错误也难于纠正，使那时的工农运动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这也是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中“左”倾错误产生和蔓延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工农运动中“左”倾错误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中国共产党诞生一开始就置身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重重包围之中。共产党员的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广大农民直接就是小生产者，而为数不多的工人也大多数来自破产的农民或农民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着我们的党、党员和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这是毫不奇怪的。小资产阶级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主观、片面，在行动上好走极端。当革命事业顺利发展时，容易陷入狂热而失去理智，巴不得一个早上就完成一切革命任务，常因急躁冒进而不顾后果，这点被后来的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再一次所证明。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脱离党的领导，产生无政府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在工农运动的过程中，自觉加强党的领导，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这不仅是纠正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条根本途径，而且也是提高整个工农革命队伍素质的一条根本途径。

（四）工农运动中阶级成份复杂，流氓无产者涌入工农运动，甚至在其中掌权，发号施令，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农民运动中，那些从前所谓踏烂皮鞋、挟烂洋伞、穿破褂子的，赌钱的，打牌的，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受官绅鄙视的种种杂七杂八的人物，在农民运动中，不但伸起头来，而且大权在握。但这些人不少劣习不改，他们在乡村农民协会中称王称霸，把乡农民协会弄成了很凶的东西。在工人运动中，“‘流氓性’带得很重。中国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了工人运动。”（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在工人运动中的工人武装也很复杂。党中央在给湖北区委的信中指出：工人纠察队是由“‘非无产阶级分子、手工业者中的勇敢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所组成。派纠察队去维护民众获得的果实将无谓地引起外国资产阶级的恐慌……。”（参见《苏联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这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工人运动。其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组织纪律性差，破坏性大；二是，有些工人当得到一些解放和胜利后，他们便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不考虑将来。这也是工农运动中“左”倾错误产生和蔓延的原因之一。

（下转第44页）

断，姑令存疑。但是，真正的原因无论属于哪一种，用来证明章太炎在炮制《代议然否论》时便主张封建帝制，是缺乏说服力的。

章太炎在充分论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后总结道，他所设计的这种没有常设议会、总统权力有限、旨在保障民权的政体，才是“谛实之共和”，他所奋斗追求的，正是这种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现实化。由于这种政体与一般中国人熟识的代议制有别，章太炎以为称之为专制亦未尝不可，不过它是“奇觚的专制”罢了。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章太炎写下了“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这句耸人听闻的话。通观《代议然否论》全文可知，太炎此语，是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地加以诠释的。

章太炎是位务实的学者，他在文章收笔处写道：“名者，实之宾也，吾汉族诸昆弟将为宾乎！”此结束语颇有些耐人寻味。太炎在时，便因弃名图实身被诬名而叹息时人反主为客，成为可怜的“实之宾”。如果太炎先生九泉有知，看到今天有的学者在研究历史时亦因循前人徒务虚名之习，是否会再次叹息他们成了可怜的“实之宾”呢？吾不得而知也。

注释：

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所言正是这种制度，其与按社会性质划分的五种社会形态之一的封建制的区别，不言自明。

② 章氏论国人地方主义浓厚之言论，在《箴新党论》中亦可读到：“今人之爱其乡邻，较诸爱国为甚。夷貉在前，视之自若，而鄙夷他省，辄以为鱼蛇虎狼之不如。一人秉权，则乡人倚之而起；一人失职，则乡人从之而衰。”

③ 参阅章太炎：《大同盟罢工论序》，见《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2。

④ 《隋书·刑法志》：“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叛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其犯此十条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⑤ 美国《独立宣言》宣布：“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有义务把那样的政府推翻，而为人民自己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言词较章氏更激进，而其保障民权之精神则出于一辙。

（上接第40页）

长期以来，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人们总是按照传统的说法：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又不全面的，因为人们忽略或不承认当时“左”倾错误存在的客观事实。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是极其复杂曲折的，当我们在总结革命遭到失败或挫折的历史教训时，总是说某一次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的，另一次又是由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的。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往往当右倾错误占主导地位时，又存在着“左”的错误；在“左”倾错误占主导地位时，也存在着右的错误。上述事实就充分说明：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错误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存在着“左”倾错误。长期以来我们不承认大革命时期也有“左”倾错误，还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大革命时期有“左”倾错误，谁就是机会主义。这就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占据统治地位，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啊！